

# 胡適與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 ——以胡適日記為考察中心

李 保 陽

### 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善本藏書歷史

普林斯頓東亞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的北美，並不特別出眾，但那年夏天，紐約電氣建造商葛思德（Guion M. Gest，一八六四—一九四八年）的生意遇到困難，於是他將收藏的大約一〇餘萬冊中文善本書，以每冊一美金的價格出售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與洛克斐勒基金會共同出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是以研究自然科學出名，愛因斯坦、奧本海默等科學家都曾在此工作，所以這批書放在高研院有點曲高和寡，未盡其用。一九四八年，這批藏書的時任主管孫念禮（Nancy Lee Swann，一八八一—一九六〇）博士即將退休，她是這批藏書十多年來付出最多的主管，她提出能否在高研院組建一個東方研究院，但這個提議被時任院長朱利葉斯·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一九〇四·四·二二—一九六七·二·一八）——曼哈頓計劃的主管科學家——否決。同時，高研院有再次出售這批藏書的計劃。據說，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也已經準備收購這批藏書。<sup>①</sup>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人事組織上並不隸屬於普林斯頓大學，只是兩家頂尖學術機構都位於普林斯頓鎮，因為是鄰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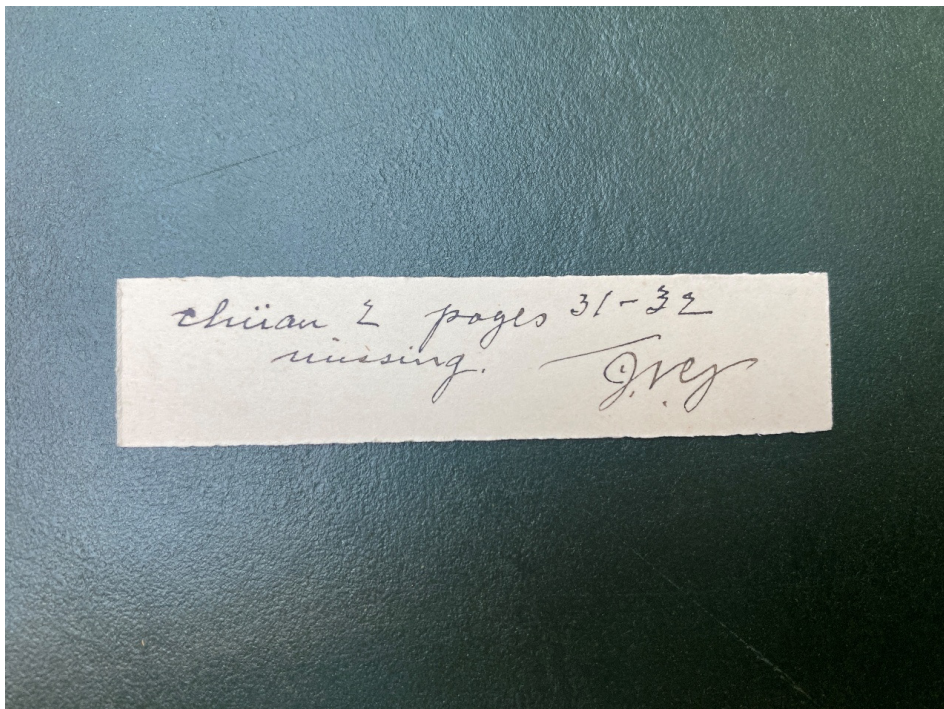
業務往來密切。高研院收購葛書後，就約定交由大學永久保管，學校也成立專門的教授委員會，對藏書進行業務諮詢，也就是說，這批書的產權，並不屬於普林斯頓大學。

葛思德的藏書起初是委託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保管，出售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後，就搬運到位於普林斯頓拿騷街（Nassau St.）上一棟物業的地下室臨時保存，同時更名為葛思德東方圖書館（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館長孫念禮博士退休後，藏書有可能被再次出售，這時大學開始認真考慮組建東亞系，以免葛氏藏書被再次轉賣。因此，葛思德藏書客觀上促進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的建制。葛思德藏書絕大多數屬於善本精品。他聘請了時任美國駐中國使館的海軍武官義理壽（Irvin Van Gorder Gills，生卒不詳）作為買辦，常駐中國收購書籍。義理壽有情報搜集專業背景，他還有一位出身滿洲旗人貴族家庭的妻子。義理壽不僅精通中國古籍知識，還在中國古籍收藏界有良好的人脈。前者表現在他為葛書編纂的精準詳細的目錄，二戰期間，該目錄在北京出版，一函四冊。義氏的這部目錄得到了繼任館長胡適的讚譽。除此而外，近幾年我也有機會仔細查檢部分葛氏藏書，我發現義理壽不僅精通中文古籍版本目錄學知識，收購態度也非常專業、嚴謹，如他會仔細地指出某書的瑕疵，如缺字、缺葉、倒裝等

錯誤細節，這對於一個非中文母語的人來說，相當之不易，尤其是中文綫裝古籍，其體量往往非常大，逐頁逐字發現其中的瑕疵，即使中文讀者都未必能夠完全做到。

義禮壽收書時，凡遇到有瑕疵的地方，都會作標記

(李保陽攝於二〇二四年夏)



義理壽在中國學術界人脈廣泛，他和陳寶琛（一八四八—一九三五）交好，最初他就是委託陳幫他在藏書圈搜尋書籍。一九三五年，陳的次子陳璧過世，陳家特意寄了一份訃告給義理壽，邀請後者參加陳璧的葬禮。二〇二五年九月一〇日至一二月七日，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舉辦的 Form & Function: The Splendors of Global Book Making 書展中，這份訃告已被展出。

## 二、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任內

胡適與葛思德圖書館淵源甚深。

胡適第一次提及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目前能查到的記錄是一九一一年五月一三日，當時中國尚處於清王朝統治時期，當天胡適在母校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觀看普林斯頓與康奈爾的田徑 (Track) 和棒球 (Baseball) 賽。時隔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一日，蔣介石召見胡適，委任胡擔任戰時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這是胡適在美完成學業後，臨危受命，第五次赴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此行為國難來」<sup>3</sup>。接命後，胡適於九月八日離開南京，沿長江船行到武漢，一三日搭飛機到香港，二〇日離港，中轉菲律賓、關島、維克 (Wake) 島、中途島、夏威夷，於二六日抵達三藩。一〇月八日抵達華府。一如胡適所言，此行為國難而來，抵達華府後，一〇月一九日之後的日記悉數從缺。胡適終身保持寫日記習慣，事無巨細，一九三七年一〇月下旬之後的日記缺如，凡有日記習慣的人，應該可以想像他那段時間的處境，不僅僅是「繁忙」二字可以概之的。我每每讀胡適日記至類此缺失處，便會捲卷遐思：歷史留白處的豐富多彩，遠勝白紙黑字的記錄，那些「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豈有與焉？歷史的迷人有趣之處，正在於斯。一九四二年

日記的大幅缺如，也可作如是觀。那段時間，胡適正在美國大使任上，當年五月一九日的日記對宋子文的滿腹牢騷，大有皮裏陽秋之意。

蔣介石委任胡適此行的目的，是計劃利用胡適在美國政、學兩界的廣泛人脈，為中國的抗戰廣作宣傳，以引起美國政府和社會對戰時中國的同情與支持。胡適不辱使命，為達成此一目的而努力奔走。在抵達美國後的半年時間裏，胡適先後遊走於華府、紐約、費城、芝加哥、西雅圖、三藩、洛杉磯、克里夫蘭、辛辛那提、波特蘭，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渥太華、多倫多等城市，行程上萬里，演講六七十場，有時單場聽眾甚至超過二〇〇〇人。在如此間不容髮的奔波中，胡適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一〇日拜訪普林斯頓大學，除了為當時研究中日關係的學生演講外，次日還接受孫念禮之邀，參觀了才在普林斯頓安頓不久的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當日的日記表明，胡適對葛館藏書有比較好的印象，但慨嘆這批藏書無用武之地。這是胡適最早和葛館交往的記錄。現任葛館館長何義壯 (Martin J. Hejduk) 博士根據孫念禮的信件，認為「胡適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到普林斯頓使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sup>5</sup>，但從現存胡適日記來看，一九三八年胡適只是應孫念禮之邀，走馬觀花地參觀了葛館而已。當時胡適志不在治學，應該沒有使用葛館藏書的計劃。離開普林斯頓後，胡適即前往中部，旋又赴歐洲考察數月，於當年一〇月四日返回美國，六日到華府接任中國駐美大使。

### 三、卸任駐美大使後

一九四三年，胡適頗有一點寂寞。一九四二年秋，因與國府高層產生矛盾，胡適辭去駐美大使公職。這年底，胡適引用了王安石的兩句詩「人散廟門燈火盡，卻尋殘夢獨多時」<sup>6</sup>抒懷。這是王安石七律《臘享》的末聯，全詩是「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

盡，卻尋殘夢獨多時。」從一九三四年開始，胡適開始編選《每天一首詩》，一九五二年完成該書。一九三四年九月一八日，他曾專門為王安石這首《臘享》寫過一段註釋：「此詩甚悲哀。今夜讀到這首詩，黯然而不歡。原來這一天是『九一八』三周年紀念日。」時隔九年，他又一次引述這首詩，除了個人實際出處，也應該和當時美國對中國抗戰的立場轉變有關。<sup>6</sup>

一九五一年，時任葛館館長的胡適寫了一篇回憶他與葛館淵源的文章《My Early Associations wit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載 Green Pyme Leaf 六，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文中回憶「他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六年間，曾經使用過葛館藏書做研究。一九四二年九月，離任大使後的大部分時間，胡適都住在紐約讀書撰述。胡適晚年學術研究重點之一是《水經注》，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他主要從事《水經注》的研究工作，並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〇日完成了一篇三三〇〇多字的《全校〈水經注〉辨偽》長文，一九四六年六月三〇日，在不斷完善過程中，此文由四萬餘字刪定為二四〇〇〇餘字。在研究《水經注》的過程中，胡適至少曾仔細研究過葛思德圖書館收藏的兩種不同版本的《水經注》文本。<sup>7</sup>

除了上引《水經注》的研究工作，胡適還借用過葛館其他藏書。據我有限的調查結果，胡適至少對葛館藏《佩文韻府》稿本進行過研究。因為尚未目驗此書，亦未看到全書的數字化影本，只能看到該館簡略的著錄：「有胡適題識一條。」<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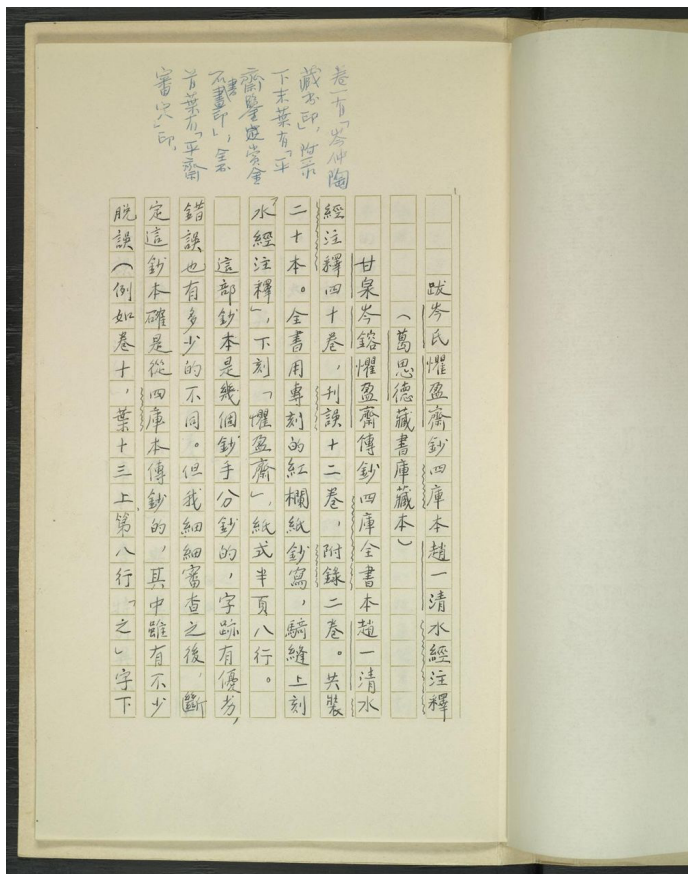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八日，胡適被美國學術界聯合會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Learned Societies) 聘為研究員和顧問。這段時間，為了有條件進行學術研究，胡適先後兩次斥巨資大量購買中文資料，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得趙元任介紹，他以一〇〇〇〇美元從哈佛大學圖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二月十三日胡適跋岑氏抄本《水經注釋》

（尤桐過錄，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TB 一九七/三四二〇。

此跋影本全文網址：<https://dpul.princeton.edu/catalog/r781wk624>。

下載日期：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八日



書館購買了該館的一部道林紙印裝的全套《四部叢刊》。一九日收到書後，他發電報給趙：「我現在像印度王公一樣富有了……」<sup>9</sup> 活現其欣喜之狀（胡適前後購買過三部《四部叢刊》，除此購自哈佛縮本外，一九五〇年四月，他還以港幣一〇五〇元從李孤帆處買了一部縮本郵寄到紐約。<sup>10</sup> 又一部二一〇〇冊線裝本《四部叢刊》，在趙元任處寄存）。另一次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九日，斥資五〇〇〇元，從波士頓一位老傳教士處收得其在日本、

中國傳教時收集的「五木箱」善本書。<sup>11</sup> 這是胡適一生中少有的一段靜坐學術冷板凳時期，所以他在這一段時間利用過葛館藏書作研究。但這一點沒法在胡適日記中得到印證，因為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的胡適日記缺漏甚多。這一點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日記可以旁證：「我在外交使命的五年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的非正式的，一九三八—四二），不曾做一點學術研究。一九四二年下任以後，我才回到我的『舊歡』，繼續作研究。」<sup>12</sup>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胡適乘船離開紐約返回中國，從抗戰受命來美辦理外交到離開，為時八年又八個月。等到下一次他再次來美尋求外援，已是三年後國共易幟風雲變換的一九四九年了。

#### 四、一九四九年後流寓美國

一九四八年底，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大陸兵敗如山倒，當時中共軍隊大兵壓境，圍困北平，城內人心惶惶。二月四日上午，胡適學生陳雪屏——就是後來任教普林斯頓、寫了《重尋胡適歷程》的余英時的岳父——在短短數小時內，先後電話、電報催促胡適離平南下。<sup>13</sup> 據胡適日記中一九四九年一月二七日的一則簡報記載，當時陝北某權威人士提出，胡、陳師徒二人也應該列入戰犯名單。<sup>14</sup> 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南京飛機已不能飛抵北平。當天晚上十一點多，蔣介石讓傅作義傳話給胡適，要他南飛，並謂第二天一早會有飛機來平接他。次日下午兩點，胡適啟程南下，飛離北平。接下來半個月的日記又告缺如。二月一五日的日記最後一句是「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沒有同行」<sup>15</sup>。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情形：胡思杜留在中國大陸接受共產黨洗腦，並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與父親公開決裂，後來因為不堪的政治壓力，於一九五七

年自殺，享年三十六歲<sup>16</sup>。有關胡思杜的這段歷史公案，近年來坊間不斷有各種解讀，成為談資。可是當我們從歷史的細節處揆度人情是非：局勢不變之際，面對和自己立場迥異、選擇分道揚鑣飛蛾撲火的成年兒子，一個父親的心境能夠如何？一九五〇年九月二三——二八日、一〇月四日的日記為我們提供了解讀這段公案的一些線索。事隔數十年，有歷史後見之明的我們，卻只能讀到那短短的十二個字。和我上面所說日記留白一樣，歷史上的那些聊聊數字的記載，往往省略掉了豐富多彩的細節，後人抱以理解之同情去填補那些空白，即是一種寬容和理解。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胡適到蔣介石官邸，蔣促他再次赴美，並說明不是要他爭取美援，止是出去看看。但我們都知道，此時蔣、胡的地位、關係和個性，言談往往並非心中真正所想，有時候甚至正話反說，給對方留下迴還轉圜的餘地。這也是我們讀歷史應抱持的一種普遍方法——以人情世故的常態理解歷史和身處歷史中的人。胡適對蔣介石的提議，日記中沒有表達可否，但從後來其記載可知，他接受了蔣的建議。一月二一日，胡適送夫人江冬秀與傅斯年夫人結伴離開大陸前往臺灣，三一日辦妥了出國護照、簽證等手續。四月六日上午一〇點，胡適乘克里夫蘭總統號遊輪離開上海，道經東京、檀香山赴美。從此一別，胡適就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這是五十八歲的胡適第六次出國。這次國變出洋的目的，是「在此為國家辨冤白謗」<sup>18</sup>。胡適這次出國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六月一四日，他在紐約和宋子文見面，宋當時「極力主張要我出來領導救國的事業」<sup>19</sup>，可能宋這次也提了想讓胡作外交部長的意思，因為在「經過七八日考慮之後」<sup>20</sup>，胡適去電時任已遷往廣州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拒受外交部長一職，所以出任外交部長應是當時政府內閣的意思，這也證實我上述對蔣介石委婉表達的猜測是正確的（這一點也可參見六月二九日的日

記）。胡適始終關心時勢並親身入場參與其中，出任駐美大使，與當局各路政客保持密切關係，又抱持自由主義立場，始終認為「私人地位實更有力量」<sup>21</sup>從事各種政治、社會事務。這個觀點有待商榷，但它是胡適個人的獨特見解和立場，也是近代西風東漸以後，傳統的知識人立身原則被衝擊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可以拿來透視中國知識人面對世變時的不同選擇和立場。只不過我們遠觀胡適時，看到的是某種「成功」意義的瀟灑，而具體到同代人身上時，看到的更多是苟且和不堪。比如 COVID-19 三年期間和目下越來越逼仄的自由空間下，中國大陸的知識人身上，哪裏還能看到半點瀟灑？胡適為中國人提供了某種出處選擇的可能，至於個人能不能選擇，這取決於個人的性情、才情、經歷和勇氣，這是胡適對中國人影響最有意義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去國後的胡適心情如何？我們從他日記風格的不變中可窺一二。這時期胡適的日記，一改往日的事無巨細繁簡照登習慣，往往只寫一個人名或者地名，如九月二四日日記只記了一個人名「天放」，讀者既不知道是被提到的這個人來訪，還是胡適去拜訪了這個人，也弄不清某個地點是什麼意思，很難知道胡適的筆下想說什麼。與此同時，日記用英文行文的比例也大幅增加，同時使用中、英文書寫的人都有這樣一個經驗：英文行文比中文快捷迅速。大家可以我用我上述提到的留白方法，推測胡適日記文體的這種變化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不過這段時間類似風格的日記，在連篇累牘之間存在一個少有的例外，就是一一月二一日，有一段有關人民日報和唐蘭的記載，這種「流亡的回望」，很能代表覺醒的中國知識人的群體心態：既不腐，又怒其不爭，卻止不住回望！<sup>22</sup>

## 五、出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在這樣矛盾落寞的心境下，時間來到一九五〇年。

孫念禮博士退休後，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搬入普林斯頓大學火石圖書館（The Firestone Library），即現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總館。此後一段時間，館長職位一直空缺，直到胡適被聘為繼任館長。胡適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的日記記載了此事。<sup>23</sup>當天，胡適寫信給普林斯頓大學，表示願意接受該校文史研究專門計劃的邀請，「想借一棲身之地，把《中國思想史》的英文簡本寫定付印」，因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實在太糟了」。這是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開始。儘管蔣介石也有計劃請胡適返回臺灣，並有相應的工作安排，<sup>24</sup>但這時的胡適應該已決定在美作常駐打算，因為普大的邀約加盟，讓胡適既能有理想的環境完成未竟的著述，也能為他和家人提供安定的生活。故一九五〇年四月底五月初，胡適安排妻子江冬秀由臺灣到香港，準備赴美團圓。五月一四日，普林斯頓大學對外公佈了消息：胡適將加盟普林斯頓大學，出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sup>25</sup>此時胡適將屆虛歲六十。加盟普大的英文報導中提到，胡適將於七月一日正式入職，但現存日記不能佐證這一點。

日記中和普林斯頓有關的另一條記載是：八月一九日，宋子文邀請胡適往鄉間遊玩，同行還有朱光沐。<sup>26</sup>朱曾在東北軍政部門任職多年，胡適認為東北在數十年戰火蹂躪之下，沒有可信的歷史記錄，故力勸朱將他在東北的見聞記錄下來，以為信史。朱說他保存的史料文件都已燒毀，但他知道郭松林事蹟甚詳。十數年前，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在中文世界一時洛陽紙貴，這本書的開篇，就是以郭松林率部反抗張作霖開篇，齊邦媛的父親當時是郭松林的得力幹將。朱光沐還告訴胡適，張學良的三弟張學曾彼時亦住在普林斯頓。日記中詳細記錄張學曾的地

址是 114 Prospect Ave.。這條街東起於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和緊貼校園南北向的華盛頓路（Washington Rd.）形成一個丁字路口。路口西南就是學校的 Frist campus Center，這棟建築在普大，相當於中國許多大學附近或校園內的學生街，現在普大東亞圖書館就在這棟樓的二樓和三樓。路口西北不遠處是普大教堂，教堂北面就是火石圖書館——胡適時代的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在焉。

何義壯博士說：「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工作一定相當孤寂，因為當時人們對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興趣不大」<sup>27</sup>「胡適繼續生活在紐約，大約每週返回普林斯頓大學一次。」從現存胡適日記的記載來看，何博士推測的這種情況應該是符合事實的。儘管普大公佈聘請胡適的消息是由時任校長哈羅德·多德斯（Harold Willis Dodds，一八八九·六·二八—一九八〇·一〇·二五）宣佈的，看起來規格頗高，給足了這位流亡紐約的前中國駐美大使、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面子，但面子的多豐滿，現實就有多骨感。自五月一四日提到普大聘請並於七月一日入職一事後，日記中再次提到和普大葛館相關的話題，已是五個月後的一〇月一六日。於此可見，當時胡適入職葛館及其工作的重要程度、可見度，並非如今日我們依現有情況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顯眼。當天的日記主要記錄日常工作內容，即對葛館特色藏書和王重民四十年代幫葛館整理的目錄進行描述和評價。<sup>28</sup>王重民四十年代在華府國會圖書館整理中文善本書，在此期間，他曾受邀到普大葛館整理藏書，留下了一部用藍色原子筆撰寫的整理記錄。一九六五年，葛館邀請屈萬里來普大整理藏書，屈氏以王重民的記錄為藍本，編成《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九六六年完稿，一九七四年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王氏原稿至今保存於葛館，我曾有機會數次親炙王重民先生手澤，一飽眼福。近年聽聞有人編輯王重民文集，此稿已被納入，不久後終將公開面世。一〇月一六日的日記末尾提到「葛思德東方書庫有醫書五百多種。」此

處有一疑問，即胡適所謂「醫書五百多種」，不知所據為何，因為根據我調查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葛館目前的中文醫學書是三百多種。識此待考。

## 六、離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之後

胡適在葛館任事雖然「孤寂」，但也偶得研究之樂，如在卸任駐美大使後那段時間，除了著手《水經註》的校勘研究，同時研究范鎮《神滅論》。時隔五六年之後，當他掌葛館事後，以明刻《弘明集》本與《梁書·范鎮傳》本范鎮《神滅論》對校，希望能得到范氏此文的一個定本，同時計畫再用宋本或者高麗本續校<sup>29</sup>。此處雖然沒有明言是在什麼地方研究，但以其所徵引之書的版本稀有程度推測，很可能是利用葛館藏書。此外，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六日，胡適根據葛館藏閻若璩《潛邱札記》所附閻氏詩《移寓雜興》，高度評價閻氏對錢謙益文學地位的肯定：「閻百詩這首詩頌揚錢謙益最公道。牧齋當然是結束明朝三百年文學史的第一大家。他被乾隆醜詆之後，他的書成了禁書，一切書中提到他的，都成了禁書。」<sup>30</sup>「此本《潛邱札記》，有稱『牧齋』處，都挖去『牧』字，若稱『錢牧齋』，則僅留『齋』字！」<sup>30</sup>胡適一生治學，都有深沉的「入世」意識，他倡導白話文運動，并非純粹的書齋式學術研究。一九四九年，他去國後的這兩年中，大陸昔日門人友生親朋故舊乃至於親生兒子，都舉起當局授意的大纛對他圍追堵截猛烈抨擊，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大公報》更在上海召開了「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會後香港《大公報》連篇累牘地刊載了朱光潛、顧頡剛、沈尹默、蔡尚思、王芸生、周谷城等與會者對胡適的批判文章。胡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底至一九五二年初的日記中附錄了相關的剪報，並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日記中對上述批判者作了簡略的評述。在這樣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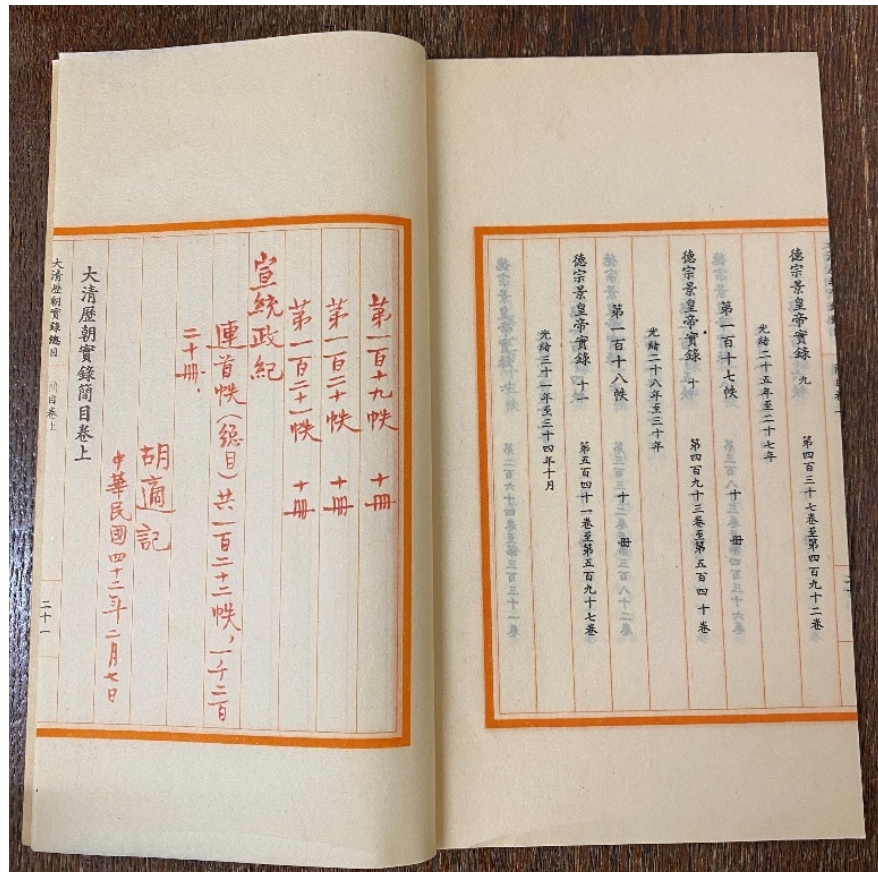
大背景下，我們很難不聯想到胡適這裏所謂的「研究」，也可能是借了牧齋的酒杯，來澆他自家胸中塊壘。錢謙益領袖晚明文壇與胡適的倡導新文化運動，錢的反清復明與胡追隨的反攻大陸，錢被乾隆醜詆和胡被「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以身作則」的共產中國列為戰犯，錢被欽定為「貳臣」和「胡適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sup>32</sup>，這些是不是似曾相識？是不是異曲同工？

現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三樓書庫一角有一排書架，上面擺放著一套共一二二函《大清歷朝實錄》，明黃色仿宮廷御用錦緞函套，這套書的第一函目錄一〇冊，卷首有胡適朱筆補寫的目錄數條。胡適日記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三日，記他花了七〇〇美金購買了一部一二二函的《大清歷朝實錄》，托房兆楹、杜聯誥夫婦郵寄到紐約胡宅。胡適買這部書是因為「此書有用，而我知道這三百年的史實太少，所以想到這書在我手頭也許可以引導我讀清史的興趣」<sup>33</sup>。過了三個星期，即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胡適就已經讀完了四十冊雍正實錄：「看完了雍正一朝的《實錄》一五九卷，共四十冊」<sup>34</sup>。這套書送抵胡宅後不數月，胡適便從葛館卸任，書則送給了葛館。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〇—四月二〇日，胡適在葛館任上，曾主辦過一場「中國書展覽」，並寫序《中國印書的一千年》<sup>35</sup>。胡適為此展覽，特別敦請陳源幫他翻拍大英博物館藏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刻本《金剛經》卷子、石刻《金剛經》敦煌本、敦煌卷子等<sup>36</sup>。胡適對此次普大葛館的展覽相當用心，二月二〇日開展當天，他在日記中表達了對展覽有欠完美的遺憾<sup>37</sup>。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胡適贈送的《大清歷朝實錄》，  
左側朱筆補書目錄出自胡適手筆

(李保陽攝於二〇二五年一〇月)



## 七、與普林斯頓大學及葛館的其他記載

以下是我根據胡適日記，將其與普大及葛館的相關記載抄錄如下，應該對關注中美圖書館史的朋友有用：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八日，從費城到普林斯頓，在哲學系吃茶、講中國哲學。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七日，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泉井久之助訪問普大，胡適導其參觀葛館藏書。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八日，在普大唯一神教派聯誼會講「不休論」。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從普林斯頓回紐約已傍晚七點，得老友朱經農死訊。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五、二七日日記中記載了葛思德的生平事業及一子一女的現狀。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五日，參加普大圖書館葛館委員會討論會。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四日，參加普大哲學系學術討論會，講《什麼是禪宗》。這部分內容應是五月一四日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但日記整理者將其分散作一四、一五、一六三天中，這一情況可參見本文注釋釋二八。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在葛館翻查《清高宗詩》、《永樂大典目錄》等書。

以上是從胡適日記中輯出所有與葛館的記錄。胡適何時因什麼原因離任葛館，日記中沒有交代，但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一六日飛返臺灣，最後一次到葛館的紀錄是一月四日。一月八日日記附錄了一份《中央日報》一〇月三〇日的報導《即將歸國之胡適博士》，報導

云：「胡先生定十一月九日離美於十二日抵臺北。」<sup>38</sup>據此可以推測，胡適離任葛館應該是一九五二年一〇月（十一月間。從一九五〇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一〇月，胡適任葛館館長為時兩年三個多月。胡適日記以記事周詳完備為人所知，舉凡軍國大政，個人生活變遷，乃至於出行里程都不憚其煩地記錄，但他為何離任普大葛館，卻在日記中只字未提，甚至連確切日期都沒有記錄，這也成了了一段聚訟紛紜的無頭公案。後人盲人摸象，各執一詞，有說是普大本土勢力排擠，有說當局為省經費云云。<sup>39</sup>據胡適的相關時段日記，我們不妨作如下的「大膽假設」：一九五二年秋，牛津大學欲聘胡適為東方哲學與宗教斯波爾丁教授（Spalding Professorship of Eastern Philosophies & Religions），胡適最初已經允諾，但他還是去信徵求國府高層以及蔣介石的意見，後者以為當時英國已與北京建交，建議胡適婉謝，胡適從之。<sup>40</sup>自一九四九年去國至彼時，蔣介石曾不止一次地傳話給胡適，邀請他回國襄佐國是。而胡適在葛館任上也的確孤寂有餘而難符其志，於是在諸多原因的交織扭合之下，欲跳槽英倫，卻被臺灣方面擋駕。此時已六十一歲的胡適在美寂寂無所作為，卻在當時的民主中國，有著朝野兩造的人望，於是選擇離開普大回國。

## 八、餘響：陳立夫、余英時

胡適日記中還提到兩個人物，從表面上看不出這二位與胡適和葛館有什麼關聯，但仍有間接的關係在焉，茲亦附論於此。

第一位是陳立夫。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胡適時任駐美大使，當天日記云：「郭任遠今天來談。他是教育部長陳立夫派來的『文化』代表。」<sup>41</sup>這裏胡適特別將「文化」二字加以引號，今天我們讀來，能明顯感受到胡適對陳立夫代表的教育部有明顯「無文化」的輕視，上文提到

胡適去任大使，是和當時國民政府高層——尤其是外交部長宋子文——有矛盾，從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胡適對陳立夫似乎也有欠好感。陳立夫在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後不久流寓美國新澤西，一九六一年後不久，他得到一筆基金的贊助，計劃整理葛館的中醫典籍，此事後來未果。又過了十七年，胡適的繼任者董世剛退休，陳立夫贈送了一副親筆書法為賀。此事我在另一篇文章《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早期史料十二種概述》中有詳述，此不贅述。

另一位是余英時。胡適日記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云：「潛山余協中來訪。他是用難民法案來美國居留的……他說起他的兒子余英時，說 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我對協中說：我常常為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sup>42</sup>余英時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二〇二一年八月逝世於普林斯頓，享年九十歲。余英時敬仰胡適，寫過多篇有關胡適的研究文章，二〇〇一年結集為《追尋胡適歷程》，在此書中，余英時對胡適盛贊有加。一九五八年的這一條日記，可以看作是胡適最後一次與普林斯頓大學關係的間接記錄。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二日（一三日屬草於費城郊外思故客河上落葉渡之抱月樓，八月三日—五日改訂於康奈爾大學郊外 Buttermilk Falls 溪畔，一〇月二四日定稿於落葉渡圖書館。關中李保陽。



### 附記：

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和幾位朋友共同創辦同人刊物《掌故》。記得有一次去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拜訪朋友，朋友轉交給我一本日本宋詞學會（現在已經更名為日本詞曲學會）芳村弘道教授送我的該會會刊《風絮》。後來學會的萩原正樹教授寫信給我，問我可否將《掌故》中刊登的龍榆生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授權給《風絮》以日文發表。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萩原老師。

後來我們 Email 通信了好多年，大多數時候都是談論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的話題，尤其是詞學研究，這是萩原老師的專長。二〇一七年秋天，我東渡扶桑，到京都、大阪訪書，第一次在立命館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科圖書室兼研究室見到萩原老師。那次，萩原老師送了我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詞譜」及び森川竹礪に關する研究》。這讓我很是意外，我的日文水平，也就僅限於跳躍式閱讀其中的漢字和極少量的假

名。但萩原老師沉甸甸的友情，和他長輩學人的謙謙之風，讓我倍感溫暖。二〇一八年春，我正在趕寫博士論文，又抽空訪書京都，這次有兩件事情終身難忘：第一件事是元宵節那天，芳村老師不顧花甲之年，甘冒舟車勞頓，陪我遍訪京都城內大小書肆；第二件事就是萩原老師邀請我參加一個讀書會，那是萩原老師在立命館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科主持的，我當時只是臨時訪客，但萩原老師卻在讀書會中間，突然邀請我發言點評，這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於是只好硬著頭皮講了一通。當時講了什麼，現在已記不清了，但那次發言卻引起臺大余筠珺博士（筠珺當時是立命館的訪問研究員）的興趣，會後我們暢聊移時。從此後，我和筠珺一直保持聯絡，這些年在海外，凡遇到任何難以尋覓的文獻資料，筠珺都會動員她先生——在搜檢稀見文獻資料方面無所不能的信宏兄——為我找到。萩原老師這種毫無偏見的前輩學人之風，讓我一直感念不盡。二〇一八年秋，我倉促去國，萩原老師得知原委，力薦我加入日本宋詞學會。他知道我跨國繳納會費手續繁瑣，主動替我繳納了會費。我向來喜歡離群索居，沒有加入過任何組織，但日本詞曲學會是個例外。萩原老師的初衷是以這樣的方式，讓我在學術界得到一份歸屬和認同，從而削減當時行走海外的我那種身心俱疲的孤寂感。如果說毫無差別地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讀書會，是萩原老師在學術上以寬博胸懷嘉勉後進的專業精神，那麼邀請我加入日本宋詞學會，則在學術之外，體現了萩原老師的一份俠義熱腸。來到美國後的幾年裏，萩原老師時常邀請我在他主編的《藝林》上發表讀書成果，這些都成為我每年檢視自己在海外未廢讀書的成績。在萩原老師看來，也許只是舉手之勞，但在我這裏，卻是一份沉甸甸的鼓勵與策勉。前年我收到立命館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科來信，信中說萩原老師將在兩年後退休，學校會出版一部榮休紀念文集，希望熟知故舊能夠以文字形式為萩原老師的學術貢獻致敬。收到信的第一時間，我就擬好了文章主題和摘要，是我多年來一直想整理發表的劉

毓盤的《濯絳宦詞話》。但近兩年我亦多事，以致錯過了紀念文集的截稿日期。最近向靳春雨博士打聽紀念文集進度——春雨是萩原老師的學生，也是十多年前那篇龍榆生自傳的日文譯者，春雨是甘肅人，和我是西北同鄉，兩次訪日的經歷，讓我們成爲了朋友——春雨告訴我，可以聯係石井真美子老師。猶記兩年前，就是石井老師 Email 聯絡我，為萩原老師榮休紀念文集約稿，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次我卻錯過了最後截稿的郵件。但石井老師告訴我，本月底之前交稿仍然可以。這讓我長舒了一口氣，因爲我記得截稿日期應該是今年的暑假。今年我碰到好多耗時費力的瑣事，從年初開始，就難得一日閑，暑假至今，更是往返紐約和費城之間凡八次，處理各種雜事。如此一來，增補完善《濯絳宦詞話》，顯然已經來不及。好在七月份的時候，我寫成《胡適與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一文的草稿，這是我今年肆力閱讀胡適日記的一篇筆記，遂將之獻給萩原老師。希望萩原老師在接下來的退休生活和工作中，為學界後進和中國文學研究予以更多的啓導。

此稿完成，曹天曉博士、何義壯博士、唐微女士提供了不少幫助，謹此致謝！

二〇二五年一〇月二八日凌晨紐約歸來，日暮再校一過，附記於落葉渡圖書館。關中李保陽。

## 注

- (1) 何義壯博士 (Martin J. Hejdra) 在二〇二五年七月二三日給我的 Email 中提到耶魯、哈佛相關細節時說：“Do note that the Yale-Harvard thing was just an intentional rumor started by Marion Levy to have the university act; it is actually not very likely to have been true……”
- (2)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上海：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本，出版日期不詳，頁三二一。

- (3) 見一九三七年九月二五日致中國駐美國三藩 (San Francisco) 總領事黃朝琴信。《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〇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七二二。下文徵引胡適日記文本皆來自此版本，為免繁冗，只注明冊次和頁碼，不再臚列版本信息。
- (4)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九八。
- (5) 何義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葛思德文庫》，載周欣平主編《東學西漸：北美東亞圖書館一八六八—二〇〇八》，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七月出版，頁一四七。下引此文同此版本，不再詳注版本信息，以省篇幅。
- (6)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一九〇七·五·二四—一九九一·九·一四) 專門研究中國晚清對外關係，他在中日戰爭期間，曾作為華府外交官員，數次常駐中國，他對中國文化和政治運作有超乎一般政客和學者的理解，根據他的記錄，他和美國朝野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抗戰失去了信心。參見費正清回憶錄《費正清中國回憶錄》(Chinabound) 第二章，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第二版，頁二七六—三〇一。胡適一九四三年那段抑鬱日子，可能與此有關。
- (7) 一九四五年底，胡適寫了有關《水經注》的兩篇文章：《跋葛思德藏書庫的岑氏懼盈齋鈔本四庫本趙一清本水經注釋》和《跋葛思德藏書庫藏的章壽康刻本趙一清本水經注釋》。胡適這兩篇文章已收入《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二一一—二一四。
- (8) 參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dpul.princeton.edu/catalog/dc534sx22d> (下載日期：二〇二五年一〇月二八日)
- (9)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四）》，頁五一九。
- (10)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七。
- (11)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四）》，頁五六九—五七〇、五七二。
- (12)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一七。
- (13)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二六—七二七。
- (14)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三七—七三八。
- (15)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二七。
- (16) 胡思杜「批判」胡適的文章題目為《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載香港《大公報》九月二二日。胡適認爲此文是「奉令發表」，并非胡思杜個人行爲。此文是否爲胡思杜所寫，學術界尚存爭論。全文又見於《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六三一—六八。從現存日記來看，胡思杜之死，胡適並不知情。

- (17) 這幾天的日記主要是中國大陸批判胡適文章的剪報，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五二一—七三。
- (18)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七八。
- (19)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四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七四—七七五。
- (20)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七八。
- (21)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七八。
- (22)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日記：「今天看了幾十張《人民日報》，最有趣的是唐蘭的一篇長文《我的參加黨訓班》（Aug. 二九），此文可與費孝通的『請求』參加黨訓班，『我只覺得這一回能參加共產黨的黨訓班，是無比的光榮，因為這是學習，我向革命的先進者學習，這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辦選舉院士，只有唐蘭來『請求』我推薦他。那是『自發的』，因為被選作院士在那時候也是『無比的光榮』。」《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八一〇。
- (23)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年底忽收到 Princeton（普林斯頓）大學的『Special Program in the Humanities Committee（『文史專門計劃』委員會）主席 Prof. Whitney J. Oates（惠特尼·J·奧茨教授）來信說，有人提我的名，為 Alfred Hodder Fellowship（阿爾佛萊德·霍德基金會）之候選人，這種 Fellowship is awarded『For the promotion of self-directed work of men with more than ordinary（這個單詞原本拼作 or dinary』，徑改）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and with more than ordinary intellectual & literary gifts』（研究基金授予『那些才華出眾、在文史學方面具有相當造詣、有一定天賦的人，資助他們從事自己課題的研究』。）」「我猜了幾天，不曉得是誰提我名。直到昨天始知是劉君芝圃。他是一個怪人，頗有點豪氣。學校主持此事的人邀他去，問他在 Humanities（文史）之學有何中國學人可以羅致。他不同我商量，就提了我的姓名。」「我想了幾天，今天才回信與 Oates（奧茨），說他們可以考慮我的姓名。我頗想借一棲身之地，把《中國思想史》的英文簡本寫定付印。」《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六一七。
- (24)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九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七八一。
- (25)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九一—三一。
- (26) 朱光沐（一八九七—？），字秀峰，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出生於浙江紹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歷任安國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部秘書及軍法處處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軍衡處處長，同澤新民儲才館教育長，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兼東北電政管理局局長等職。一九三一年，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總務處處長。一九三二年任北平綏靖公署總務處處長。見《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一九〇—一九一。
- (27) 何義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葛思德文庫》。
- (28)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Gest Oriental Library（葛思德東方書庫）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曾請王重民先生去編一個善本書目。時間太匆匆，他只能將原本留交 Gest Library（葛思德東方書庫）。我曾翻看幾次，到今天，匆匆點數重民認為『善本』的總數：A、經部一四〇種；B、史部（明實錄未計）二〇九種；C、子部四一一種，GM（醫書）三六種；D、集部三三七種。一、二、三三種。此中只包括一小部分明刻佛典。重民尚有單頁幾張，如《永樂大典》二卷，如《明實錄》殘存本。總計重民的善本目所收一千一百四十種。Gest L.（葛思德東方書庫）收有舊刻佛經幾千冊（折子本），我曾抽點幾十函，其中最可寶貴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刻的藏經，即所謂『磧砂藏』。向來記載磧砂板《藏經》的，說刻經起於紹定四年（一二三二），迄於武宗至大二年（一二三〇九）。我近來查得《十誦律》卷卅三（存三）有『磧砂延聖寺比丘志願情（保陽按，『情』可能是『請』之誤）旨：伏自年庚戌（至大三年，一二三〇九），五十七歲，七月初二日建生，發心施中統鈔伍伯錠，助開本寺大藏板，流通聖教……。」這裡還有『庚戌』是否至大三年的疑問。『有前六十年（淳祐十年，一二五〇）的可能，但我看當是二二一〇。』我又查得《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駕二（首頁換清五）及駕三」，其卷二與卷三都有題記：『平江路磧砂寺大藏經局，伏承……本路嘉定州，大報國圓通寺住持比丘明了……發心助緣開雕……』其卷二（駕二）題記之尾行明記：『延祐二年歲在乙卯八月（一二三五）。』此毫無可疑。Gest Library（葛思德東方書庫）藏有磧砂板經幾百冊（數目不曾細查），甚可寶貴。（其中一部分是十四世紀晚期印刷的。）又有明朝刻經十多冊（折子本），約有四個不同的時代：一·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二·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三·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癸巳）；四·萬曆及明末（「清初施印，有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施主墨筆題記」。Gest Library（葛思德東方書庫）有醫書

- 五百多種，也甚可寶貴。此等書將來都會散失了。也許我們將來還得到海外來做影片回去收藏參考呢。」《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七四—七六。按：這段日記在安徽教育版中被分為兩部分（二六日、一七日），以「是否至大三年……」屬一七日。我認為胡適這篇日記應該屬於同一天（二六日）所記的內容。蓋民國時期流行預先印製好日期的日記簿，每頁或者每若干頁為一天。這裏可能是由於一六日的內容太多，向後擠占了一七日的頁面，整理者便以頁面上印製的字跡為準，將這篇原屬於同一天（二六日）的文字人為割裂為兩天的內容（二六日、一七日）。因為我沒有看到日記原稿，識此以待考。
- (29)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一八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四〇、頁一四八—一四九。
- (30)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四〇—一四一。
- (31) 《大公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報導《北大南大教授分別座談，控訴胡適，檢討張伯苓》，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日記附剪報。《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五三。
- (32) 同注二九。
- (33)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八六。
- (34)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〇二。
- (35) 全文見一九五二年二月一七日日記附錄，《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〇三—二二二。
- (36)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日記、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二月一七日日記，分別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一八六、頁二〇二、頁二〇三。
- (37)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二二。
- (38)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六〇。
- (39) 有說童世剛排擠胡適云者，更是站不住腳，因為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胡適自臺灣飛返紐約，接機的十餘人中就有童世剛。可見胡適卸任葛思德館長任後，與童世剛的關係一直很和睦。何義壯博士二〇二五年七月二三日給筆者的 Email 云：“I think that it looks like Hu Shi just left the Gest Collection without caring for it; you give that impression. But he had made sure that there was a replacement, Tong Shigang! Otherwise I doubt he would have left at that time.”
- (40)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〇日、九月一—二三日、一〇月一日日記，見《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二四五、頁二四六—二四九，頁二五四。
- (41)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四六五—四六六。
- (42) 《胡適日記全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頁五一八—五一九。